

Column

■扁平世界

从“龙象之争”到“龙象共舞”

中印两国在具备太多的相似之时,也存在着众多的竞争之处:这个被学者、媒体热议的问题,其实已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中印两国本身在发展过程中认识的桎梏。两国所遵循的发展路径有很大差异,不乏相互借鉴、合作共赢的基础。只有突破这一思维定势,尽早脱离“竞争论”的认识误区,中印两国才能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摸索出更多切实可行的合作架构与模式,实现共同发展。

◎陆志明
金融学博士,独立撰稿人

同样地处东亚,同样都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同样身为当今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之间在具备太多的相似之时,也存在着众多的竞争之处。这个被学者、媒体热议的问题,其实已成了以往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中印两国本身在发展过程中认识的桎梏。只有突破这一思维定势,才能主导未来中印两国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笔者以为,1月14日两国总理在中印首脑会晤时共同签署的《关于二十一世纪共同展望》,无疑是这一思维模式转变的标志性产物。

回首过去的几十年,中印两国之间既有过同为发展中国家亲密合作的经历,也同样不乏意识形态与局部地缘政治之争。然而在社会经济发展主导的21世纪,同为东亚大国的中印之间似乎更加关注本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崛起与对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赶超。此时,传统政发国家抛出“龙象之争”强调中印之间的对立和误解的可能。而华等为中等国家在印度遭到排斥等事件已经一再表明,中印之间只有尽早脱离“竞争论”的认识误区,双方才会走上“合作共赢”的快车道。

此次中印高层会晤,反映了双方希望撇开以往的认识误区与不睦,将中印合作纳入主流的务实决

心和态度。事实上,中印之间虽同为东亚发展中大国,同样经历着社会经济体制快速变革的历史阶段,但是两国所遵循的发展路径却有很大的差异,两国之间不乏相互借鉴、合作共赢的基础。

就目前两国的发展现状来看,中国在初、中级工业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占优;而印度在医药、化工和软件等产业方面稍胜一筹。此次中印双方签订的《中印两国铁道部间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建设部同印度房屋和城郊贫困缓和部间谅解备忘录》等10项协议也反映了中印双方在各自占优的领域加强合作的愿望和要求。印度总理辛格说得很好:我们两个政府一直在低估我们各自产业的能力,以及其发展相互商业行为的渴望。

作为可能左右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力量,中印之间推崇合作,而非一味地强调竞争不仅有利于充分挖掘两国的增长潜力,同时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繁荣,试想,超过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两大区域加强合作,将会给解决世界贫富和落后问题带来怎样的突破性的进展!

中印两国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还会带来更强的社会文化认同感,彼此之间的产品无论在消费能力和可用性方面,相对于欧美的高端产品更具竞争力,相互之间庞大的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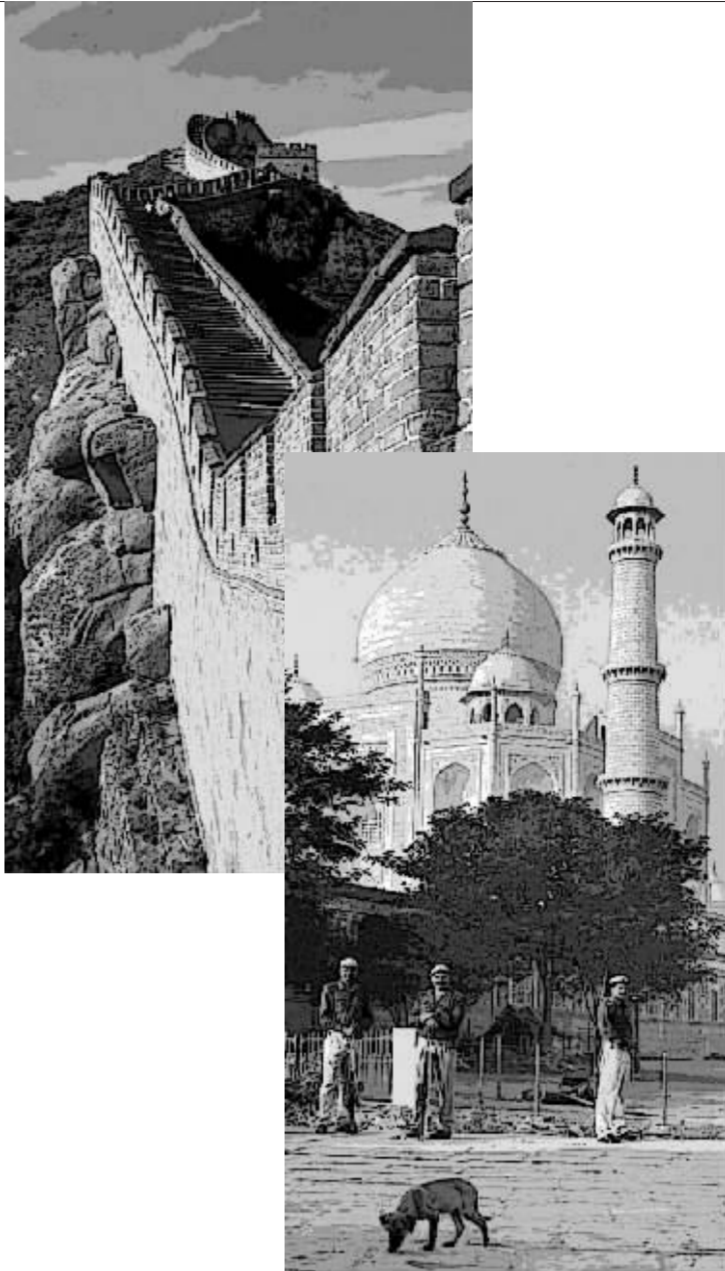
场容量将会为彼此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

万丈高楼平地起,中印之间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印度对华贸易逆差,虽然2007年中印双边贸易额高达387亿美元,距此前双方拟定的2010年400亿仅一步之遥,但是中印之间的贸易结构并未优化,印对华贸易的逆差扩大将会侵蚀中印双边合作的基石。如何扭转这一不利的局面,从根本上来说还需依赖于发挥双方在贸易领域的优势。

就目前来说,印度在农产品、矿产资源出口方面相对于中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而受到国际上农产品、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冲击,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急剧上升,因而如何与印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实现互惠互利是重要突破口。

此外,在投资领域,我国一向更为重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入,相对忽略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事实上,只要投资有利于本国产业和经济社会的进步,就不应存在投资来源地的歧视。而印度作为对外投资输出大于外资流入的国家,其对中国的投资应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印度优势产业一软件业的资本输出更是中国学习的良好机遇。

恰如辛格所言,中印双方的交流还有赖于建立长期合作的框架结构、长期共赢的商业模式。目前所做的仍处于探索阶段,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无限商机和区域政治价值已颇令人心动。相信中印双方会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摸索出更多切实可行的合作架构与模式,以推动东亚两强之间的“龙象共舞”。



■地狱上的繁荣

最可敬的和最危险的

◎冯维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亚太系博士生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博士论文执笔者

在日本,“先生”二字有其特殊的含义。不明这点,新入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注册登记时往往会闹笑话。按照日本的惯例,他们以“先生”二字称呼教务处、图书馆、国际学生中心等部门为之办理入学手续的老师,常常让这些老师深感尴尬和不安。因为根据那部习惯,即便是此等部门中的干部也严格地属于“职员”的范畴,与“教员”不可同日而语。倘若高呼之为先生,即便有却之不恭的困扰,他们也决不清愿愧而受之。对于职员,只需以通常人们之间互相使用的一般敬语称为“某さん(音sang)”即可。因为一般而言,在日本只有三种人会被尊称为先生:一是传道授业的教师,二是救人济世的医者,三是国会议员、政党魁首等政治家。

教师塑造国人的灵魂,且日本以教育立国的方针显扬于世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可观的果实,配当以“先生”的敬称看来顺理成章。医者拯救民众的身体,良医仁心妙手悬壶济世活人性命,于患者有再造之恩;而人食五谷,生百病,帝王将相与草莽布衣概莫能外,所以全社会对医者特别地加以尊敬似乎也无可厚非。只是,政府官员凭什么与前两位先生鼎足而三呢?实际上,西方民主社会从一开始就没指望政治家是一心只念国家福祉、他人利益而无自利的高尚之人、纯粹之人、脱离了低级趣味之人。恰恰相反,他们向来被视为私欲横流的野心家,对他们的使用是在民众直接行使权力不可行的前提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控制使用”,需得依附或代表不同利益团体的政治家相互掣肘而不得垄断权力对人民施暴。《联邦党人文集》讨论政府结构的第五十一篇就说得非常明白:“防止一些不可饶恕的错误:一是重大决策完全是由行政长官确定,基本没有民众参与;二是因为贪污腐败,场馆建筑的整体规划和建设成本提高了四倍。直到今天,一些激进人士还将当年的政府称为“极其愚钝和弱智的政府”。

当然,不同的国家因其历史、文化、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会表现出不同形式的国家治理特色,但在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原则上,所有国家都应该是一致的,即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然而,要切实地建构起这种对等的实践却并非易事,这离不开全社会的参与,也离不开“好事者”的“好事”之举。

曾令自民党几乎找不出一个“干净”的一线领导人来继任因牵涉丑闻下野的竹下登出任首相。新世纪也未给日本政坛带来特别的运气,2002年更因为大部分时间用于追究丑闻,国会被称为“金权政治丑闻国会”。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国防用品贪污案,也牵涉前防卫次官守屋武昌这样的高官。政府官员有如此不佳的纪录,却仍得以与教师、医生共同配享在道德的祭坛之上,道理何在?仅仅以三者对社会的重要性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

教师、医生与政府官员有一个共同的行业特点:服务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并且服务质量严重依赖于难以被第三方所核实的服务者禀赋和行动。教师施教是否得法,医生施治是否合理,政治家对国事是否尽心,都不是学生、病人、选民或者某个独立第三方(比如法院)能够简单地量化评价并实施监督的。但是教师若师德沦丧,医生若唯利是图,政治家若再有再造之恩;而人食五谷,生百病,帝王将相与草莽布衣概莫能外,所以全社会对医者特别地加以尊敬似乎也无可厚非。只是,政府官员凭什么与前两位先生鼎足而三呢?实际上,西方民主社会从一开始就没指望政治家是一心只念国家福祉、他人利益而无自利的高尚之人、纯粹之人、脱离了低级趣味之人。恰恰相反,他们向来被视为私欲横流的野心家,对他们的使用是在民众直接行使权力不可行的前提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控制使用”,需得依附或代表不同利益团体的政治家相互掣肘而不得垄断权力对人民施暴。《联邦党人文集》讨论政府结构的第五十一篇就说得非常明白:“防止一些不可饶恕的错误:一是重大决策完全是由行政长官确定,基本没有民众参与;二是因为贪污腐败,场馆建筑的整体规划和建设成本提高了四倍。直到今天,一些激进人士还将当年的政府称为“极其愚钝和弱智的政府”。

所以,为了让这些危险的从业者克己奉公,必须有一种制度设计,让他们的收入不仅仅依附于难以为人所周知的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根植于他所处行业得到的普遍尊敬。实际上,在日本这样一个潘乃德(Benedict)即所谓“耻感文化”盛行的地方,来自第三方审判的罪感对于当事人的影响,很可能比不上同侪和世人之“不齿”对他的影响。因此,赋予最危险者以最真挚的崇敬,客观上是在增加他们败德的机会成本,他们被举得越高,一旦摔下必定永世不得翻身,绝对不会有异地上天工作甚至平调之类的“轻释下”之举。

当然,并不是说生活中日本人对“先生”们的尊敬直接出自对他们的警惕,而是这种尊敬实际上或者说客观上能够带来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于是在长期社会演化中收效出了这般的结果。人们通常经验地这样使用敬称,未必能明白其中的原理,更不见得是遵循原理而实施。好比发明和使用水力磨坊的人,不是因为懂得势能和动能相互转换的道理一样。

■大英小语

大裁员寒流 冲向最怕失业的欧美人

◎李俊辰 jonsson.li@gmail.com
欧金伦敦投资有限公司特约经济学家和金融投融资管理顾问,现居伦敦

很难得,潮湿多阴的伦敦在新年伊始的这几日有些阳光。于是,笔者与来自法国的朋友结伴在伦敦金融城边缘的金丝雀码头聚餐。

金丝雀码头距离伦敦金融城的东部标志性建筑——苏格兰银行总部大楼3英里,由废弃港区改建而成。码头的地产开发商来自加拿大,他们在这里建造了18个月内建成7.5座高楼这一伦敦建筑业的奇迹。当然,其钢筋水泥和玻璃幕墙的建筑群落引来不少伦敦人的“恶感”。但是,金丝雀码头的实用价值足够吸引商业机构考虑迈进,趋之若鹜有人在。伦敦金融城机场距离金丝雀码头也是3英里,被城市建筑拥簇的这家机场自然成了今日商务人士的兴奋点。13家航空公司每周在此运行1000多个航班,可以直达曼彻斯特、卡地夫、利物浦、阿姆斯特丹、卢森堡、巴黎、法兰克福等20多个国内和国际城市目的地。

不过,和朋友的话题似乎有些沉重:“我从这个月起不在花旗工作了!”吓下了一跳。这位朋友是花旗银行在法国从事投行业务的总监,属于高级别职员。

欧洲乃至英国在金融业方面开始大幅裁员的预言要成现实?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08年,伦敦金融城将遭遇自2001年以来的首次裁员,不过这次可能针对的主要是银行机构。许多资深银行家认为,公司活动可能倒退3年前的水平——回到信贷泡沫开始时。

英国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估计,投行在今年的裁员大潮中将首当其冲,削减2300个工作岗位,基金管理业紧随其后,将削减1600个。保险业将削减大约600个,猎头等专业服务公司将削减300个。在投行行业中,最易受冲击的是那些所谓的结构信贷部门。该部门将那些深奥的信贷证券组合在一起,而这些证券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使其对如今渴望确定性和安全感的投资者完全不具吸引力。实际上,为银行业筹资预计将成为那些投行雇员的一个收入来源,这些雇员擅长为金融机构提供服务。这提供了从股票承销、出售战略股权,以及其它与股票相关的筹资中赚取佣金的潜在可能。此外,自然资源 and 医药等其它领域的整合时机也已成熟。这为以股票为基础的大型并购活动提供了极大可能。所有此类潜在活动都可能让银行思量再三,然后再进行大规模的全面裁员。

这份报告作者之一的布卢姆菲尔德女士认为:“进入2008年,我们很可能看到今年增加的每两个职位中将减少一个。虽然这个数字仅相当于总体裁员2%,但是他们感觉形势严重,因为伦敦金融城2007年增加就业机会速度极快。”报告引用的数据说,伦敦金融城2007年创造11000个就业机会,比先前预测的4000高出许多。该中心强调,伦敦金融城裁员是个暂时的现象,将持续到2009年。但是报告预测:“中国经济发展在2010年才会进入良性循环,在此之前伦敦金融城就业不会恢复到创纪录的水平。”

但如果真要离职,那么金融人士有否良好的心理素质就显得很重要了。有调查显示,欧美人最怕失业,其程度竟高于惧怕死亡。失业者在精神上承受的压力往往超过了经济上的,他们不仅经济收入大减,而且还常常得不到周围亲朋好友的理解和支持,因而使当事人对自尊产生了否定感,在心理上遭到致命打击。长期建立起来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突然中止,更带来一系列健康和心理问题:郁闷、呼吸不畅、复发心脏病或高血压、夫妻反目、家庭不和乃至离婚等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比起通货膨胀,失业更不能让人接受,因为前者的受损对象是大众全体,而后者却是“倒霉我一个”,在他人生活状态为自身生活质量参照系的大众心理支配下,失业者心理万难承受,这就引出了失业者如何做好自身心理调适的问题。

陈眉公辑录《幽窗小记》里面收录有这样一副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这副对联原出自明人洪应明的《菜根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人做事能视宠辱如花开花落般平常,才能不惊;视职位去留如云卷云舒般变幻,才能无意。《小窗幽记》为明陈继儒集编的修身处世格言,分十二卷,条条都是人生的回味和处世的领悟。不知生活在今日欧洲的人们,对中国古人这种豁达的人生感悟会有多少共鸣?现代社会不断进步,但每个人的负荷却更重。许多的研究甚至以城市白领上班走路的速度来判断这个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自然与人类的日益分离是文明社会不可避免的缺点。无可否认,是非、成败、得失让人或喜、或悲、或惊、或论、或忧、或惧,一旦所欲难以实现,一旦所想难以成功,一旦希望落空成了幻影,就会失落、失意乃至失志。

有人这么说:其正如人潮中的一点起伏,随时间沉淀。它所带来的忧虑与恐慌,也许只是像冰冷的秋夜里一片一片沉积下来的落叶,也许你不倾心去听,永远也听不到它积累的声音,它积累你也是逐渐麻木的一层。或许在阳光的清晨醒来,你才可以看到它厚厚的一层。但,当你推开窗户,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时,阳光是否真的照到了你心灵的每一个角落? “去留无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心境平和、淡泊自然,面对生活新的挑战。“云卷云舒”——大丈夫方能屈伸。不过无论如何,说得容易做起来难。心理上的调试对暂时离职的人员是不可攻破的一个堡垒。是真英雄自洒脱,是真名士自风流!有这么一句话颇有哲理:失业,只不过是忙忙碌碌的人生中抽出一小空罢了! “实在不行,我自己开一个投资咨询公司。”我的法国朋友这样说。

对!这不失为一个东山再起,充实自我的机会。

■长短集

“好事者”多 “好事”之举更多

——枫叶之国闻见感之二

◎胡晓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在加拿大考察期间,感触最深的就是加拿大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处理。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权利还是义务,都应当是公益心的体现,公益心越强的人,他的权利就应该越大。因此,加拿大入经常被加拿大的外国人看作是“好事者”。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在一个标示允许钓鱼的鱼塘内,某个钓鱼者(加拿大的外籍人)或许是因为钓的太少,也或许是心情急切,以至于下塘捞鱼。附近的一个钓鱼者(加拿大本地人)看到后,善意地提醒他注意自己的行为。不想,等钓鱼结束,那位捞鱼者径直将其所钓之鱼连同所捞之鱼一起拿了准备带回家,远处的那位提醒者见状便拿起自己的鱼迅速地追了过来,明确地告诉他:“如果您嫌自己钓的鱼少,可以把我的鱼拿走,但无论如何,请您把捞的鱼放回鱼塘。”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这样的“好事者”,那么,捞鱼就必然成为普遍现象。最终,要么鱼塘变为水塘,要么鱼塘就要竖起一块“严禁钓鱼”的牌子。正是多了这些可爱的“好事者”,大家才能相安无事,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也能更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小事还反映出了加拿大对个人品质的认知态度。即,他们推定,每一个人都会严格遵守行为规范,但如果你的行为被证明是违背了社会规范,那么,你将会遭到他人的指责。与此不同,我们一直是以“盖棺定论”作为对一个人品质认定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的实质是在最初不论个人品质好坏,或者干脆认定你可能是不好的,接下来,你需要通过

自己的行为来证明你是好的。两种认定方式产生的结果自然大不同。比如,对一个人从好到坏的认定模式是一种社会福利做减法的过程,而对一个人从坏到好的认定模式则社会福利做加法的过程。如果这种社会福利是以物质化的形式表现,那么,后者就会产生过度追求名利的趋势,反而会助长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

在加拿大考察期间,还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无论你做什么事,只要没有对他人造成坏的影响,那就是可行的;反之,就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比如,加拿大政府对“瘾君子”的规定:在看得见天空的地方抽大麻是合法的,但出售大麻却是违法的。这个在本质上具有矛盾和冲突的规则,却典型地体现了加拿大政府尊重个人自由选择以及保护他人权利这两个有时相互对立问题的解决方式。在这里,对个人行为自由选择的尊重是个人权利的体现,而不能影响到他人的生活则是个人义务的集中体现。正是立足在这样的治理理念之上,加拿大各地并没有泛滥无度的抽大麻行为,整个社会秩序井然。即使是在外籍人士聚集和居住的地区,一切也都是非常协调和有序。

一个显见的问题是,在确保最大程度满足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当政府与个人在某些问题上产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处理呢?据了解,发生此种情况时,各类非政府机构就会出面与政府谈判。据当地人介绍,加拿大的非政府机构谈判能力非常强大,政府部门不得不让其三分。比如,如果政府计划兴建一个大中型

馆,但这个计划若得不到协会和社会团体的支持,政府就无法通过行政力量强制开工。当然,协会和社会团体支持计划的标准并不完全是利益补偿,更多的还有这些大型场馆开工与建成之后是否影响自然环境的质量、居民生存质量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成本(如征税加重等)。由此观之,加拿大政府的权力非常有限,反过来,全民通过协会和社会团体参政、议政的能力则非常强大。此类事件隐喻地道出了政府权力运用相关的三个问题,即权为何制?权为何属?权为何用?对此,加拿大学者的回答是,权应为独立第三方(社会团体、协会)所制,权应为人民所属,权应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所用。

这些优良的理念当然不会是天然就扎根于此的,它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程,其间也有失败的教训。例如,蒙特利尔是加拿大举办过世博会和奥运会的城市,但当你今天去世博会旧址时,你会发现:除了美国馆当年遗留下的巨型圆球建筑以外,其它的均已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当地专家介绍,当年举办世博会时,除了一些客观上的政治原因以外,政府在主观上也犯下了一些不可饶恕的错误:一是重大决策完全是由行政长官确定,基本没有民众参与;二是因为贪污腐败,场馆建筑的整体规划和建设成本提高了四倍。直到今天,一些激进人士还将当年的政府称为“极其愚钝和弱智的政府”。

当然,不同的国家因其历史、文化、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会表现出不同形式的国家治理特色,但在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原则上,所有国家都应该是一致的,即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然而,要切实地建构起这种对等的实践却并非易事,这离不开全社会的参与,也离不开“好事者”的“好事”之举。